

系统功能翻译研究中的及物性翻译转换

1.1 引言

系统功能翻译研究迄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围绕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理念和观点，从多个视角和维度探讨和审视翻译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 1 章聚焦系统功能翻译研究中的及物性翻译转换，首先简要回顾系统功能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论述该研究范式的优越性。围绕及物性翻译转换这一核心议题，从元功能对等、语境理论和译文评估等几个方面梳理相关研究，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系统功能翻译研究

1.2.1 系统功能翻译研究范式的优越性

翻译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对翻译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3 世纪。古代和近现代的相关论述基本属于语文学路径（philological approach）的翻译研究。古代西方翻译理论从公元前 3 世纪直至欧洲中世纪结束为止，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家有西塞罗（Cicero）、贺拉斯（Horatius）和圣哲罗姆（St. Jerome）等，他们对直译、意译、忠实等翻译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多为只言片语的论述，缺乏理论的系统性。西方近现代的翻译理论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止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多种颇具影响力的翻译学说，如英国的德莱顿（Dryden）将翻译分为逐字翻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仿译（imitation），突破了以往二分的局限，被誉为 17 世纪英国翻译理论的顶峰，并对此后的翻译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泰特勒（Tytler）在《论翻译的原理》（Tytler, 1790）

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¹；法国的多雷（Dolet）、德国的路德（Luther）和歌德（Goethe），均主张译者应使用通俗明了的语言进行翻译。语文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主要呈现出经验式、印象式、主观式的特点，研究者多结合个人的翻译实践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翻译研究从语言学中吸取营养，从而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翻译理论因此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许钧、穆雷（2009：75）对翻译研究所借鉴的语言学理论进行了如下的概括：“半个世纪以来，翻译研究者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关联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等中，吸取了相关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描述和分析。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也因此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流派。”语言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力求摆脱研究者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突破了以往只关注翻译经验和细节的局限性，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重视探寻翻译的规律性特征。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对意义关注不足，也未考虑到文化这一宏观的语言因素，而意义和文化又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要素。

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译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和开放的趋势，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其中包括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1974）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尼南贾娜（Niranjana, 1992）、斯皮瓦克（Spivak, 1992）和罗宾逊（Robinson, 1997）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西蒙（Simon, 1996）和弗洛图（Flotow, 1997）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它们常被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在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产生、接受和影响，对翻译活动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关注其中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身份建构以及翻译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文化路径的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学科限制，拓展了相关的学术发展空间，逐步形成了开放的多元局面。但是，意识形态和文化色彩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对翻译本体的偏离，使得语言本身的分析边缘化。针对这一问题，不少学者（如 Snell-Hornby, 2006；吕俊，2004；孙艺风，2010）呼吁翻译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文本本身，回归语言本体。

系统功能翻译研究正是回归语言本体，同时又联系语言外部因素的

1 该三原则具体为：译者应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与手法与原作等同；译文应同原文同样流畅。

优化范式。系统功能语言学主张把语言放在一定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这种研究思路既立足于语言本身,基于真实的语篇,以意义为本,同时又联系言语发生的外部因素,十分契合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对形式和意义的关注也是其回归语言本体的表现。司显柱(2011)在对翻译研究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评述的基础上,认为依托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翻译研究是优化的范式,因为它既摆脱了语文学路径经验性和印象性的不足,又没有像结构主义语言学路径一样把翻译看作机械的语言转换活动,也没有像文化路径一样脱离语言本体。系统功能路径的翻译研究“集语言与文化分析于一体”(司显柱,2004: 52-54),是一种优化的研究范式。

不仅如此,系统功能语言学还采用了语言多维度的全息视角,主要包括语言层次、实例化、元功能、级阶、坐标轴和精密度六个维度。这些维度涵盖的视角既有宏观层面又有微观层面,既有意义层面又有形式层面,既有语言层面又有文化层面。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可以充分借鉴该全息视角,对翻译问题的描写和解释以及对翻译规律的探寻和预测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作用。相比传统的研究范式,系统功能翻译研究既克服了语文学路径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弥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路径忽视意义和文化的不足,也避免了文化路径偏离文本的倾向,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

1.2.2 系统功能翻译研究的历史回顾

国外的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在50年代理论的创始阶段就已经开始用语言学家的眼光看待翻译问题。1956年,韩礼德发表了第一篇基于语言系统思想研究翻译的文章。随后,韩礼德(Halliday, 1962/2005, 1964)就语言学和翻译的关系、翻译对等的概念等做了进一步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韩礼德正是系统功能翻译研究的开拓者。

60年代,卡特福德(Catford, 1965)完成了第一部研究专著,基于阶和范畴语法,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模式,探讨了翻译的诸多问题。90年代,系统功能翻译研究达到第一次高潮,涌现出多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著作(Bell, 1991; Baker, 1992; House, 1977, 1997; Hatim & Mason, 1990, 1997; Munday, 1997),它们围绕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元功能的翻译、语域分析和语境分析在翻译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地探讨,可看作是系统功能翻译研究的成功尝试,在译界产生较大影响。

进入 21 世纪以后,伴随着多语交际、多语研究的兴起以及适用语言学概念的提出,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翻译问题,其中以斯坦纳和亚洛普(Steiner & Yallop, 2001)为代表作,书中收录了韩礼德、麦西森等多位学者对系统功能翻译研究进行深入思考的文章。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在地域上也波及到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传统的研究大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之外,还涌现了德国、巴西、法国、日本等诸多新生力量,其中以德国和巴西的研究尤为突出,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斯坦纳(Steiner)和特奇(Teich)以及巴西的瓦斯康塞洛斯(Vasconcellos)。

与此同时,系统功能翻译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注重新课题的挖掘,强调实证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新时期杰出的研究成果,有的将扩展修正后的语域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Steiner, 2001, 2004, 2005);有的从语言对比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跨语变体(Teich, 2001, 2003);有的侧重经验意义在译语文本中的重新建构(Calzada Pérez, 2007),有的关注评价意义的传递和再现(de Souza, 2010; Munday, 2012);有的从整体上论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价值(Munday, 2002; Malmkjaer, 2005; Halliday, 2001, 2009a, 2010; Vasconcellos, 2009; Manfredi, 2008, 2012)。上述成果深化了传统的翻译研究课题,并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代表了 21 世纪国外系统功能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也推动了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国内的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郭著章(1989)从语域的视角审视翻译,胡壮麟、朱永生和张德禄(1989)较早涉及到翻译中的三大元功能对等的问题。此后,该方向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并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的研究者——黄国文、张美芳、司显柱、徐珺等,他们均取得了多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有的侧重探索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并指出此种途径相比其他途径的优势所在,如黄国文(2002, 2004, 2006, 2009a);有的侧重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某一具体理论同翻译研究的结合,如张美芳(2001, 2002, 2009)探讨了语境理论和文本类型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有的关注该语言学理论对翻译批评或译文评估的贡献,如司显柱(2004, 2006, 2007, 2011);有的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观点应用到古典小说的英译中,如徐珺(2002, 2003, 2004, 2005)等。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系统功能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内容:依据语言三大元功能,探讨翻译中如何实现概念意义、人际意义

和语篇意义的对等；依据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概念，探讨语域²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依据衔接与连贯理论³探讨翻译中的连贯问题；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工具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估等。借助功能语言学进行语篇分析式的翻译研究俨然已是当代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陈浪，2008）。

翻译中的及物性转换是系统功能翻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折射出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多方面问题。下文围绕与及物性转换相关的核心议题，重点对翻译的及物性转换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近年呈现出的新特点，指出存在的不足，并阐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3 及物性翻译转换

及物性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不同语言学派对及物性的认识存在差异。系统功能语言学把及物性看作小句的一种属性，不同于以往将其看作动词属性的观点。从元功能的角度来看，及物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下建构人类经验的语法系统，是经验意义在词汇语法层中的体现形式。及物性系统把经验世界建构为一组可供操作的过程类型（Halliday, 1994: 106）。也就是说，任何语言的经验意义都会表现为一系列的及物性过程。

构成及物性过程小句的三个基本功能成分是参与者（participant）、过程（process）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ce）。其中，“过程”是其核心功能成分，通常表现为动词词组，在及物性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同“过程”直接相关的功能成分是“参与者”，一般可基于“过程”的性质对其进行预测和推断，多表现为名词词组。“环境成分”通过某种逻辑语义关系来加强“过程+参与者”这一功能配置，为其提供事件过程的时间、地点、方式、条件、因果等语义信息，多表现为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

韩礼德（Halliday, 1994）、韩礼德和麦西森（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依据英语及物性过程的配置特点，将其分为六类：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每种过程还可继续分出若干次类，如物质过程可进

2 语域理论，参见韩礼德和韩茹凯（Halliday & Hasan, 1989: 29-42）。

3 衔接理论，参见韩礼德和韩茹凯（Halliday & Hasan, 1976）。

一步分为动作过程和事件过程，关系过程可分为包孕类、环境类和属有类，心理过程可分为觉察类、情感类和认知类等。“参与者+过程”功能配置在六类及物性过程小句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目标

关系过程：载体+过程+属性

被识别者+过程+识别者

心理过程：意识者+过程+现象

言语过程：言说者+过程+言语内容

行为过程：行为者+过程

存在过程：存在物+过程

以上每个成分都是从功能语义上区分的，与传统语法研究中的句法成分有很大不同，体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功能和语义为基础的核心理念。每种配置还可添加环境成分，构成“参与者+过程+环境成分”的完整及物性配置，用来表征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各种经验现象。

如何实现元功能对等是系统功能翻译研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事实上，针对该议题，学界已取得多项成果。例如，黄国文（2004）采用了功能语言学的六步法（观察、读解、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估）进行语篇分析，结合语言的三大元功能，读解原文和译文在表征经验、交流信息和组织语篇上的意义，并说明译语文本在哪些方面与原文的意义发生偏离，导致偏离的原因又是什么。赵德全（2006a）同样围绕三大元功能及其各自的词汇语法体现形式，试图探索英汉翻译中元功能如何实现对等。能够串起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一根主线便是“对等”，它是一个颇有争议却又讨论不止的核心概念。翻译的语言学派几乎都围绕此概念展开，只是“对等”的涵义有所差异，从中也折射出不同的语言学思想，系统功能语言学观照下的翻译对等同样有其特有的内涵。

1.3.1 系统功能语言学观照下的翻译对等

翻译离不开语言，翻译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学问题。对于翻译研究而言，语言学绝不是可有可无。关于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翻译研究本身属于对比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范围，但随着学界对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呼吁，翻译研究逐渐摆脱对比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束缚；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可以为翻译研究

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系统的分析框架，持这种观点的多为语言学路径的翻译研究者（或翻译的语言学派）；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作用极其有限，语言学派推崇备至的“对等”，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持这种观点的多为文化路径的翻译研究者（或翻译的文化学派）。

福赛特在《翻译与语言：语言学理论读解》（Fawcett, 1997）一书的前言部分讨论了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之间爱恨交加的关系。他既不赞同对语言学不屑一顾的态度，也不把语言学理论看作翻译研究的救星，而是相信翻译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只能通过语言学来描述和解释。更进一步说，译者如果对语言学缺乏基本了解，就像是工匠干活却没设备齐工具。应该说，这种观点在处理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的关系中是客观、妥当的，既肯定了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价值，又没有过分地放大这种价值，把语言学凌驾于翻译研究之上。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生成语言学，再到系统功能语言学，从语用学到认知语言学，尽管各个学派所依据的理论框架各异，但贯穿语言学路径翻译研究的主线始终如一，即翻译的对等问题。几乎所有语言学路径的翻译研究都围绕着“对等”而展开，如雅各布逊（Jakobson, 1959/2004: 139）的“有差异的对等”，奈达（Nida, 1964）的“动态对等”⁴，格特（Gutt, 1991）的“语用对等”，贝克（Baker, 1992）的“语篇对等”等。讨论“对等”的文献如此之多，以至于福赛特（Fawcett, 1997: 52）认为“对等”无疑是翻译研究中耗费纸张最多的概念之一⁵。

既然“对等”是语言学路径翻译研究的核心概念，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礼德已经开始从语言学的视角审视对等问题。

韩礼德（Halliday, 1956）针对当时机器翻译的话题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翻译是寻找原文“对等项”并将其替换的过程，而这些“对等项”是特定语言系统中的成分（同上：81）。尽管这一时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术语范畴还未正式使用，但是翻译时在目的语语言系统中寻找原文“对等项”的基本思想已经确立。随后，在讨论语言学和机器

4 后改为功能对等（Nida & Taber, 1969）。

5 尽管对等是翻译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但学界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如，纽马克（Newmark, 1981）认为翻译对等的论题，要么太理论化，要么太随机化。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 1988）认为对等一词含义模糊，给人以语言对称的错觉。巴斯内特（Bassnett, 1991）更是认为对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翻译的关系时,韩礼德(Halliday, 1962/2005)再次强调从语言学视角看待翻译问题的重要性,注重语言和翻译的天然联系,并主张遵循语言系统的思想。

韩礼德(Halliday, 1964: 124)进一步讨论了翻译对等,把“对等”这一概念相对化,认为它是“或多或少”(more or less)而非绝对意义上“或是或非”的问题,因为“不同语言中语言活动所发生的两种语境不是完全一样的”。翻译实践中,他主张应“在较多对等或较少对等这个刻度的某点上设定一个翻译的可接受度门槛”(同上:142)。韩礼德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明确了“对等”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概念,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种认识无疑是先进的,反映了其意义和语境相互交织的基本观点。因此,对等实为“语境意义的对等”,只有基于这种“对等”才能达成翻译作为交际活动的目的。韩礼德(Halliday, 1992)发展了Halliday(1964)关于意义和语境的观点,认为“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因而意义对等项就是语境中的功能对等项”(同上:16)。应该说,系统功能翻译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已初步形成,其中“翻译是创建意义的活动”以及“意义对等项就是语境中的功能对等项”的论述,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基本共识。但是,两种语言互译过程中功能对等项的词汇语法表现究竟是什么,还需要结合两种特定的语言系统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

韩礼德(Halliday, 2001)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层次维、元功能维和级阶维,提出了“对等类型观”及“对等价值”的概念,认为任何具体的翻译实例中,不同语言层次、元功能或级阶上的翻译对等价值有高低不等之分。一般说来,语言层次越高、词汇语法的级阶越高,其对等价值也越高;就元功能来讲,只有当概念功能可被忽略时,高对等值才能附于人际功能或语篇功能。“翻译对等类型观”和“翻译对等价值”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追求绝对意义上的对等不现实,语言的多维度势必会带来多种类型的翻译对等,不同类型的对等有着不同的价值,从而为译者的选择提供了空间,对等也变得更为灵活。韩礼德(Halliday, 2009a, 2010)结合翻译实例进一步阐释了此观点,强调了对等的相对性和对等类型的多样性。

麦西森(Matthiessen, 2001: 78)借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渐变体的概念,把翻译对等和翻译转换看作译语和源语差异渐变体上的两端。翻译环境越宽,翻译对等程度越高;翻译环境越窄,翻译转换程度越高。因此对等是一个程度化的概念,同翻译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翻译环境的取舍能够带来

不同类型的翻译对等。亚洛普 (Yallop, 2001: 242) 在《翻译对等的建构》一文解构了传统的“对等”概念, 认为对等都是有限的等同, 对等不是基于完全等同的对等, 而是基于“相似多样性”(同上: 242)的对等。

1.3.2 及物性翻译转换和元功能对等

卡特福德 (Catford, 1965) 是最早利用系统功能语法思想研究翻译问题的一部专著, 指出翻译理论借鉴意义理论 (theory of meaning) 很显然十分必要的 (1965: 35)。作者在“阶和范畴”⁶ 的语言学框架下系统地讨论了翻译的定义、分类、翻译对等、翻译转换和可译性限度等诸多问题, “翻译对等”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和“翻译转换” (translation shift) 更是成为语言学路径翻译研究的一组基本概念。翻译是“用一种对等的语言 (译语) 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 (原语) 的文本材料”, 翻译实践的核心问题就是找到译语中这样的对等项, 而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是界定翻译对等的本质和条件 (同上: 20-21)。

卡特福德的历史贡献在于结合当时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将翻译研究从经验式、印象式、评注式的语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基于阶和范畴语法, 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模式, 使其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其不足之处表现在虽然涉及了弗斯的语境意义理论, 但分析的例句均为脱离语境的、理想化的句子, 同时也未能冲出句子的藩篱面向更为广阔的语篇。需要注意的是, 卡特福德借鉴的是早期的阶和范畴语法, “系统”和“功能”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均未能充分体现。韩礼德 (Halliday, 1967a, 1967b, 1968) 首次提出及物性的概念, 并在韩礼德 (Halliday, 1985, 1994) 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同时, 系统功能语法也逐渐成熟, “功能”的思想在研究中日益得到重视。

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系统功能翻译研究的高潮, 涌现出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 (House, 1977, 1997; Bell, 1991; Baker, 1992; Hatim & Mason 1990, 1997) 等等, 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可看作是系统功能翻译研究的成功尝试。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借鉴语言的元功能理论和语域理论, 其中不乏对元功能翻译对等和及物性转换的探讨。

先来看国外的研究。贝尔 (Bell, 1991) 将三大元功能与语言的逻辑、语法和修辞有机地结合起来, 论述了语言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

6 参见韩礼德 (Halliday, 1961)。

义如何在翻译中通过语言的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和主位系统来体现。讨论概念意义的翻译时,贝尔(Bell, 1991: 130)认为“参与者和过程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句法中得以实现,不同的语言之间差异巨大”,这便给译者带来诸多困难。这一观点,实际上指出了两套语言系统的差异对翻译中及物性过程的配置具有重要影响,同时批评了及物性过程简单形式对等的盲目性。然而,不同的语言系统究竟如何影响参与者和过程的配置,这种影响是否会导致译文的意义与原文发生偏离,作者并没有继续讨论。总的来说,该书是系统功能翻译研究的有益尝试,尤其扩大了该研究方法在学界的影响力,但是书中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尚欠深入。

贝克(Baker, 1992)是另一项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专著成果。该书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并借鉴语义学、语用学的相关研究,探讨了各个语言层次上的翻译问题,包括词、句子结构、段落的信息结构、语篇的衔接和连贯等。作者从低到高在一系列层次上审视翻译的对等问题,超越了词语、句子的藩篱,把翻译对等的触角深进更广阔的领域——语篇。其中,第5章重点论述了语篇元功能与翻译的关系,引入主位—述位推进模式和信息结构理论来分析翻译的篇章对等。虽然讨论过程中没有直接提及翻译中的及物性转换,但就其分析的内容来看,着力于透过语言形式的分析和选择达到译文与原文意义的对等。贝克对于普及系统功能语言学有益于翻译研究这一思想功不可没。但是,由于这是一本服务于译员培训和翻译教学的教材式著作,很多问题并未具体、深入地展开。

哈特姆和梅森合作推出了两部语篇分析路径翻译研究的代表作(Hatim & Mason, 1990, 1997),在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哈特姆和梅森(Hatim & Mason, 1997)结合篇章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翻译理论来研究跨文化交际,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模式讨论翻译问题,除了在语篇维度考察译文之外,还深入及物性分析、语域分析、人际功能的操纵等多个方面。可以看出,及物性分析是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语篇分析时的一项重要语言指标,服务于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比较。

梅森(Mason, 2004)和卡尔扎达·佩雷斯(Calzada Pérez, 2007)是专门研究概念元功能中及物性过程翻译的两项成果,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梅森(Mason, 2004)考察了经验意义在传译中所导致的及物性过程转换。他首先把及物性过程转换分为强制性和选择性两种,并认为选择性的及物性转换对于翻译研究尤其具有重要价值。梅森通过对翻译中的及物性转换实例加以分析,认为及物性转换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这